



大使的历程

——出使八国记

李炯才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大使的历程

——出使八国记

〔新加坡〕李炯才 著

6017.2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173号

大 使 的 历 程

——出使八国记

〔新加坡〕 李炯才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海淀华新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8.75 印张 250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册

ISBN 7-80049-346-6/K·8 定价：5.90元

特精装定价：13.00元

序

有人形容外交官是一种举止文雅但不那么光明正大，总是不择手段地致力于促进本国利益的人。这种说法是夸大其词了，对近年来其重要性不断增加的这个行业是不公平的。今天，国际局势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的事务的影响与该国国内因素的影响一样大。外交的目的是影响外国，以维护和促进贸易、文化利益，保护侨居的国民，尤其是维护国家安全。外交官的首要任务是向本国政府提供有关驻在国的情况和分析，同时用精心考虑的方式影响驻在国，以最好地增进本国利益。

一位优秀的大使，能够向本国政府提供从报纸消息和官方报告中收集不到的情报和观点。他必须深入到事物表面之下去探讨，在该国通常无法接触到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发掘隐匿的事实。一位杰出的大使总是会持续获得东道国的信任和尊重，即使有关两国的关系不时处于危险的紧张状态也如此。

我认识李炯才先生已经多年，他具备一个优秀的大使所必需的许多素质。读者可以从本书中了解，他具有能够跟驻在国人民建立感情而又不失去他的客观性的天赋。他对其他国家人民有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希望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如此这般。例如，他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时，怀着同情心，但却不偏不倚地探究印度尼西亚文化的“梦幻世界”。

诚然，李炯才先生在担任大使时撰写的有深远见识的函电报告，使我作为外交部长的工作困难减轻了。他向我提供的知识和

情况都是以一般公众为对象的书籍和报纸报道中所没有的。李炯才作为新加坡大使，站在新加坡的利益立场，评估了种种问题和局势发展。

新加坡的大使们实际上在国外做什么呢？他们是以出席鸡尾酒会和宴会消磨时间或干脆无所事事吗？

李先生的回忆录告诉读者，作为一个外交官，有比饮酒和赴宴更重要的任务。

S · 拉贾拉南(签字)

鸣 谢

首先，我要感谢S·拉贾拉南先生为本书写的序言中所给予的赞誉。我是在他任外交部长期间担任外交官的，他现任我国第二副总理。我也要感谢在我担任大使时的新加坡外交部常务次长S·R·内森先生，他阅读了全部文稿，并提出中肯的和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最后，我也要向沙伦·西迪克夫人致谢，她对本书有关印度尼西亚的篇章，提出了宝贵的观点。

我要对本书中所提到的领导人、公务人员和人们致谢，他们使我能够写出这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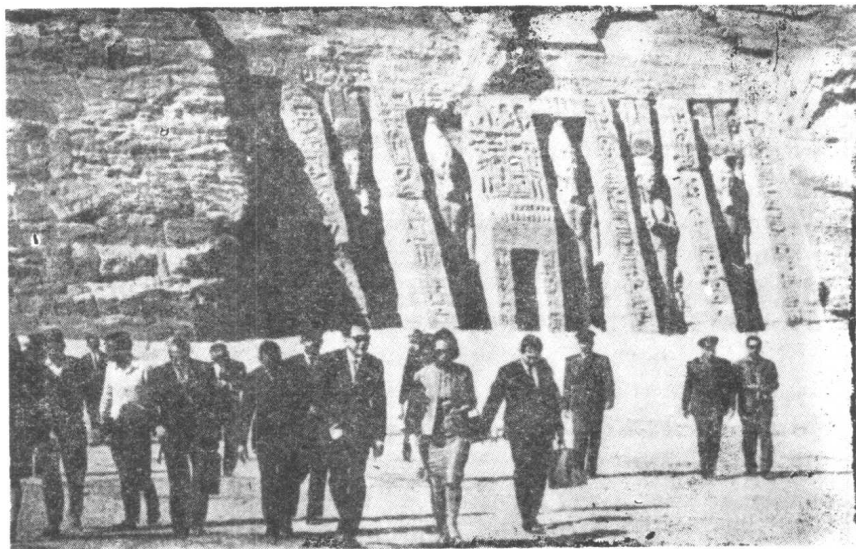
作者像



埃及总统纳塞尔(右)与李炯才大使谈笑风生(1968)



李大使为阿拉伯听众弹中国古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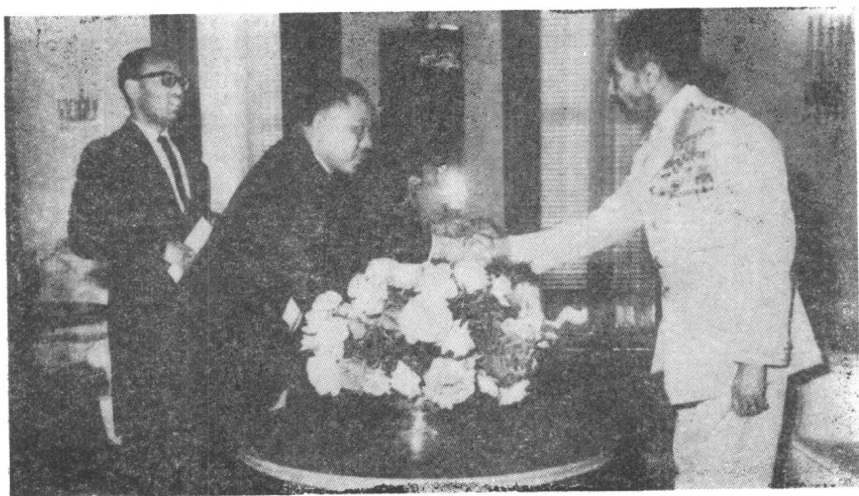
李光耀总理参观埃及古神庙，李大使陪同



李大使夫妇在开罗会见柬埔寨外交大臣沙林察



李大使向阿尤布汗总统呈递国书（1968）



李大使同海尔·塞拉西皇帝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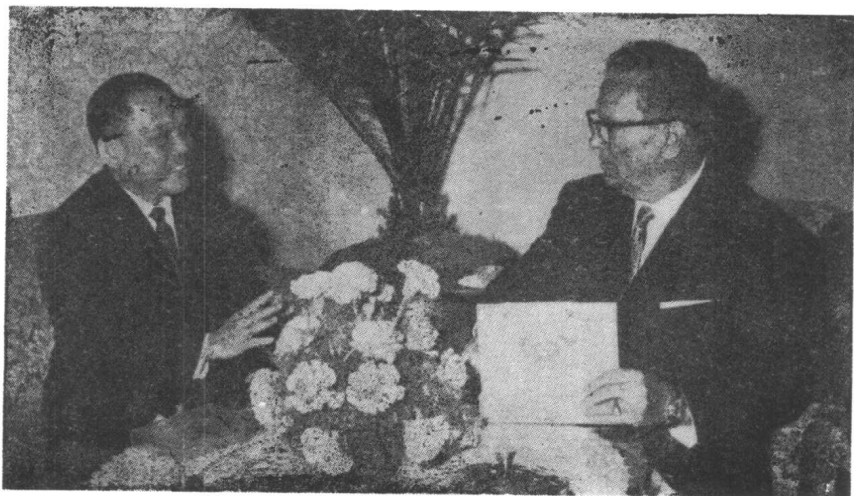
李大使同赫卢总统交谈（1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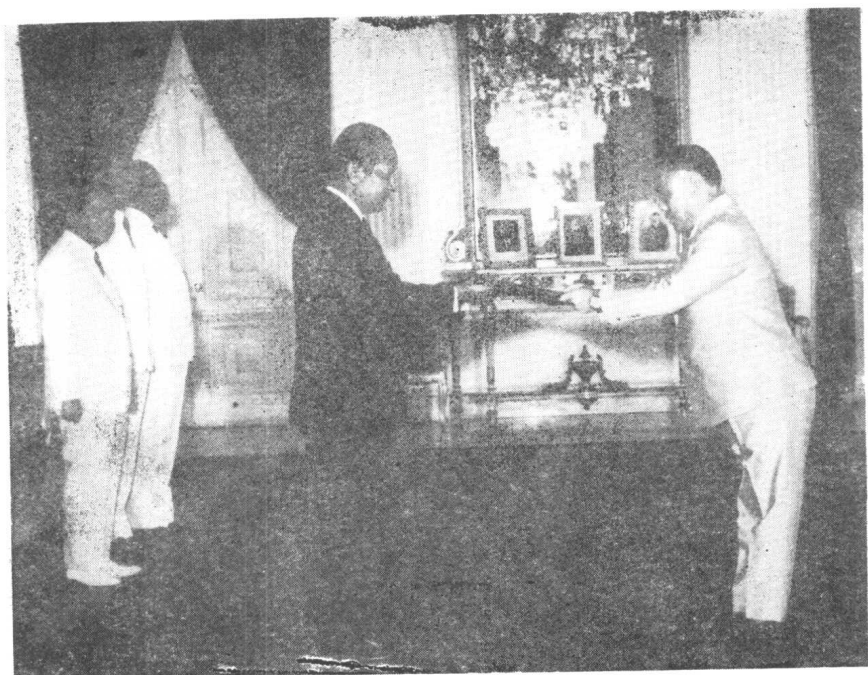
李大使在布里俄尼岛铁托总统官邸检阅仪仗队（1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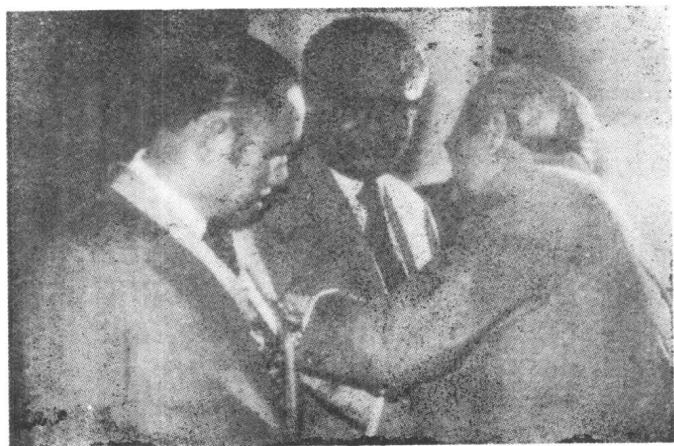
李大使向铁托总统呈递国书（1969）



铁托总统问李大使是否抽烟（1969）



李大使向苏哈托总统呈递国书（1972）



印尼外长马利克代表政府向李大使授勋

前言：我到日本等国担任大使

我最初被任命为驻开罗大使时，并未料到会去三个大陆、经历六年半的漫长旅程。这段大使的旅程始于1968年，前后去了开罗、伊斯兰堡、亚的斯亚贝巴、贝尔格莱德、贝鲁特，最后是雅加达。1974年底我结束了驻外使节的工作，回到新加坡继续我的政治事业。1980年大选时我顺利当选，我先受命在外交部工作，后来转到总理公署，同时担任主管基层组织的人民协会副主席。在1984年大选即将来临时，我突然被提名为驻日本大使，这真使我难作决定。我的孩子们正在新加坡上学，可我必须离开新加坡至少三年。我不愿意再次体验在雅加达四年半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总是独居的那种生活了。我想起那几年的孤单寂寞，不想再过那种日子。如果这次不得不去日本，我将把孩子们带上。

我到东京作了初步调查，得知为孩子们在那里安排上学一点不成问题。最大的顾虑消除了，剩下就是我的政治事业。我担任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已25年，在人民行动党政府不同职位工作了同样长的年月，与此同时又是一名外交官。在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我曾六次被选入国会，现在已到60岁的成熟年龄。我想到了一代新人正在成长起来，将掌管政府。尽管在1968—1974年我任大使期间仍然保持了国会议员的席位，但经验告诉我，既任外交官又担任议员是很麻烦的。首先，我远离选民却还必须考虑他们的福利，可是要考虑这些问题就难免影响外交事务。年轻的时候还好，但我已经60岁了，把两件事都作好，对我简直不可能。因此我决定停止我的政治事业，尽全力去作好政府的大使。我没

有参加1984年的大选，半个世纪从政我想是足够了。

1974年我作为驻印尼大使离任时，根本未料到10年后再次就任。我也没有预料到会去一个曾经控制过新加坡、马来亚以及整个东南亚的国家去就任大使。

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马来亚时，我正在槟城刚刚结束剑桥入学资格考试和钟灵中学高中三年级课程。钟灵中学是反对日本的情绪很强烈的学校。由于日本人的入侵，所有的华人学校都是反日的。在殖民地时期，英国当局允许它的国民办自己的教育。华人办的华人学校，给学生灌输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但上了英国人办的学校的学生则把英国视为祖国。当日本入侵了中国东三省，后来在1937年又占领了北京时，受过华人教育的人都憎恨日本人，因为他们把中国当作祖国。

在学校期间，我参加了所有的抗日活动。我在剧中扮演日本人，参加了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我还指挥一个口琴乐队，为抗日活动募捐。报纸上登过我的照片。当日本人来到并且屠杀我们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时，我躲到丛林中去了。

那时我17岁，我剃了光头，象农民一样干了将近三年，完全与文明社会隔绝。有一天，一个为日本警察工作的我的少年时期的朋友，领了一些日本人到距大山脚镇不远的武吉坡拉比丛林进行搜捕。他看见了我，出于一点良心，没有出卖我。他告诉了受过英式教育的我的一个哥哥，说我应当在为时还不太晚以前离开丛林。我那时已有些政治头脑，就向他要良民证明信，在拿到证明信后，我离开了丛林。

我四处寻找工作而毫无结果。最后我决定参加一个日语教师速成班。学了三个月的课程，结业后就在北海当了小学教师。

学校校长是个中年的日本人，他很英俊，留着小胡子。这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日本人。他颇有绅士风度，讲话轻缓，举止端庄。随着对他的了解的增多，我逐渐有了好感。

我当教师的时候，我的两个兄弟因为从卢纳斯镇私运大米而被捕了。卢纳斯镇距北海约20公里，是大米产地。北海的人们因为大米限量供应，总是不够吃，所以常从卢纳斯镇偷运大米补充口粮。我的两兄弟被带到居林，可能还要转到马来亚吉打的双溪大年镇去，在那里受审，有可能被枪毙。日本人把私运大米当作严重罪行，因为他们害怕人们把大米运给对日本人作战的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

我去见校长，并向他保证我的兄弟都是受英国的教育，不是共产党人。我请求他的帮助，使我的兄弟获释。校长的心肠很好，他给宪兵队的人打了电话，后来我也见到了此人。那个宪兵队的人立即与居林警察局的什么人通了话，几分钟后，他告诉我去居林警察局为我的兄弟获释办手续。我的日语知识总会有用的。我去了警察局，我的两兄弟转危为安。

这是我同日本人打交道的最初经验，我必须承认，那位日本人校长和那个宪兵队的人都是好心人。

这件事之后不久，日本人投降了。我到马来亚槟榔屿华语报纸《星槟日报》当了记者。后来又转到该报的姊妹报、新加坡的《星洲日报》，该报专门登载审判战争罪行的文章，被告都是那些在新加坡犯有暴行的责任者。后来我目睹了两名日本中将在章宜监狱被绞死，其中一个河村三郎，另一个是大石政幸。当时，在场的还有华人民援的代表。

在日本占领时期，我很少有机会与日本人交往。我不能忘记那时每天早上要向天皇裕仁宫城遥拜，早课前面向东方，唱日本国歌《君之代》。那段日子里，在整个日本帝国的控制范围，从中国到东南亚，无论是被征服的人们还是日本人自己，都得向天皇鞠躬。一切献给天皇陛下的绝对意志，是使日本人的心里铭刻对陛下赤诚敬爱、服从和忠诚乃是一切纯血统日本人的崇高义务的结果。我们的校长曾告诉我们：这种精神要求所有日本人都无保留地坚信天皇的绝对正确，因为他是天帝的后裔。天皇是神圣的天

神，以致任何人在他面前都不得直视其尊颜。

1944年我向天皇鞠躬时，丝毫没有料到40年后我会作为新加坡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向他递交国书。那是1984年7月10日在东京皇宫内进行的。

下午1点45分左右，皇宫礼宾官中岛先生来到我在六本木的官邸。我已经穿好了燕尾服。我记得第一次穿燕尾服是向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递交国书的时候，他后来被赶下台，在一套三间屋的套房里，悲惨地死去。中岛先生用汽车接我去东京市中心的皇宫饭店。我们喝了杯茶，然后乘马车去皇宫。在马车的前后各有四名骑马护卫，身穿彩色制服，令人想起古代的日本。驾马车的人戴着象英国人戴的那种黑色高帽。

我们穿过宽广宁静的御花园，花园里有苍翠的精心培植的松树。那里已经有一群人，他们露出好奇的目光，翘首观看新任大使的模样，犹如争看新娘。这是我第二次乘坐马车，第一次是向已故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递交国书的时候。那次是在铁托的避暑地布里俄尼岛。两次的马蹄声是同样清脆，但却是截然不同的场合。我清楚地记得在布里俄尼岛遇到日本驻南斯拉夫大使时他说过的话。当时我是上任，递交国书，他却是离任告辞。日本大使曾野明先生1968年是这样评论铁托的：“我认为，日本天皇对于在日本发生的事比铁托对于在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了解的更多一些。而实际上在生活方面，铁托比日本天皇更奢华。”在日本仅六个月，我就想到那位日本大使说的是对的。

我听说当初的皇宫比现在这座更宏伟，但是被盟国空军炸成了砾堆，现在这座是重建的，看起来朴素庄重，但有气派。

进入宫殿，一幅巨大的油画使我入迷了。画面上是大海和三块巨岩。这幅画使我感到宁静，我真情愿停一会观赏一番，但是时间不贷。那出自年过80的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的手笔。东山的画在日本标价最高。我还注意到宫内的所有枝形吊灯和地毯都是紫色的。紫色大概是皇室的颜色。